



国防大学 2 071 0217 9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27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盛世才在新疆	包尔汉(1)
我任阿山宣慰使的回忆	包尔汉(19)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在新疆的兴灭	包尔汉(91)
西藏从政纪略	陈锡璋(98)
成吉思汗陵寝概况与内迁经过	谢再善(127)
成陵内迁及途经延安纪实	楚明善(135)
洋和尚照空	巨 赞(139)
倪柝声与“基督徒聚会处”	阎迦勒(150)
竹舍轶闻 ——国民党利用战犯建立国防部 第三研究组的始末	黄 瀛(158)
 质疑·补充·订正	
两航起义史实有遗漏	王大庄等(169)

盛世才在新疆*

包尔汉

盛世才入新经过

盛世才，字晋庸，一八九二年生于辽宁省开原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幼时在西丰县初小、沈阳第五高小、辽宁省立农林中学学习过。一九一五年毕业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一九一七年赴日留学，住过东京明治大学。一九一九年随留日学生回国请愿代表团回到上海。其他代表都参加了全国学生总会组织的争取收回国土（青岛）运动的工作，盛却跑到广东进入了李根源主办的韶关讲武堂，毕业后，经李根源介绍回东北任奉军第八旅郭松龄部下的排、连长及上尉参谋等职。此时其原配妻子病故，经郭介绍，与郭之义女邱毓芳结婚。一九二三年，经郭之推荐，张作霖送他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其妻同去日本，到东京女子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郭倒戈反对张作霖失败后，张撤消了保送盛学习的公费。因盛善于钻营，以后又得到孙传芳、冯玉祥以及蒋介石的资助，才完成了日本陆大的学习。一九二七年盛回国后，投入国民党军贺耀组部下任参谋，以后又调总司令部任上校参谋兼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团教官。一九二八年任行营参谋处代理科长，一九二九年调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任科长。

盛在南京久屈科长职位，郁郁不得志，常与彭昭贤交往，有他

* 这个材料中的一部分是张义吾同志看了我的回忆录后补充的。

适之意。一九二九年秋，新疆主席金树仁派其秘书长鲁效祖到南京公干，鲁与彭善，经彭介绍，鲁答应盛与其妻同去新疆。金树仁当时不愿军人进新疆，尤其是金之五弟树信更是极力反对军人进新疆。所以在金令新疆驻南京办事处查明盛是参谋本部军官后，即电令鲁不准带盛去新疆。而鲁效祖因已答应盛辞去南京军职，整束了行装，不便再表示拒绝，仍请盛同去。此时正值中东路事变，无法经过西伯利亚去新疆，盛在北京闲住了数月，其间又借机回东北活动一番，想在张学良部下谋一职务，未成。一九三〇年秋盛就随鲁效祖去了新疆。

盛到新疆后，在鲁家住了一个星期，金树仁开始不愿见他，以后因碍于鲁的情面，才委盛为督署上校参谋兼卫队营教练，后来又委盛兼任军官学校战术教官。那时，盛是新疆唯一的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人材，他在军校里极力拉拢学生，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这些学生都成了盛军中的骨干。一九三一年，因哈密民变，省军屡败，金树仁才开始重用盛世才。先委盛为鲁效祖的参谋长，后又委为张培元的参谋长，让盛赴东路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更委盛为东路总指挥，让盛深入南北山中与和加尼牙孜作战。当时马仲英负伤回关内，盛军转战于吐、鄯等地，被誉为常胜将军。一九三三年，马世明部队逼近迪化，盛又被金树仁调回迪化附近作战，收复乾德、阜康等地。“四·一二”时盛看到金树仁大势已去，便答应与政变者合作，取得督办一职，以后又用毒狠的手段杀害了政变参与者。

盛世才上台前新疆的一些情况

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贪污成风。杨增新认为人一发财就不会造反。他曾说：“他们贪污不要紧，只要不反对政府就行了。”所谓政府，就是指他自己。

当时我通过给俄商伊斯哈克当翻译认识了迪化道尹（专员）樊耀南（湖北公安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樊经常谈论要挽救新疆

就要反对贪官污吏。他主张民族平等，整顿财政，整顿军事，发展教育。他说：“杨将军(增新)今天利用这个民族反对其他民族，明天又利用另一个民族反对其他民族，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执行的完全是一套愚民政策，搞得教育很落后，连报纸也没有，贪官污吏却到处都是。”当时杨增新非但不准出版报纸，甚至连其他省出版的报纸也不准看。我本来心里就非常痛恨这些黑暗现象，听了樊耀南的话以后，感到樊的思想在当时的官吏中是难得的，十分拥护樊的主张，并和樊交了朋友。

有一天我和塔赫尔伯克(留克沁人)、马克苏提(阿斯塔纳人)、克里木汗(喀什人)等几个好朋友在我家里谈论新疆的局势，大家都感到杨增新的愚民政策太反动。我就向大家介绍了樊耀南的情况，说他很清廉，思想进步，并把他的主张告诉了大家。我们一致认为他的主张能挽救新疆，如果他能当省长，新疆就有希望了。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宣传樊的主张，拥护他当省长的秘密小组，选我当了这个小组的组长。后来阿山哈萨克族艾林王爷的弟弟沙里福汗、库车人尼扎木丁、我的妹夫迪化人海达尔和教师赫沙木丁也参加了这个组织。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秘密宣传樊耀南的主张，宣传让樊耀南当省长。我把这件事告诉樊时，他也很高兴。

一九二七年，杨增新流露出了他要离开新疆到内地去的意思，并把家属、财产都经过苏联送到天津去了。这时我们小组的人都认为杨走后，樊一定能当上新疆省长，就更加替他大力宣传。我还帮助樊结识了省议会会长肉孜阿吉，让他们搞好关系，使樊取得肉孜阿吉的支持。

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政法学校进行考试时，杨增新、樊耀南都去了。樊趁机秘密组织人把杨枪杀后，便到省政府拿关防印信，谁知民政厅厅长金树仁又召集自己亲近的同乡军人，调集部队，包围了樊，并把樊杀了。这样，金树仁就上了台。

事情发生时我正在吐鲁番，并不知道这个情况。金树仁上台后，杀了不少与樊耀南有关系的人。他虽然知道我与樊的关系很

好，但没抓到我的把柄，也就没有马上杀我。一九二九年的一天，金树仁把我叫去，派我到德国买碾路机。当时我任省汽车公司经理。于是，我就和潘治义（曾是我的秘书，后任汽车公司秘书）假道苏联去了德国。我在德国买了碾路机、盒子枪，发运回新疆。三个月后，我打电报给金，要求回国，金却叫我长期住在德国。这时我心里明白了：金树仁虽然不杀我，却要把我放逐国外，以除心头之患。

一九三三年一月，我经金树仁批准回迪化。走到离迪化十几华里的大石土时，我的家属和好友沙里福汗前来迎接。正说话间，突然跑来一个骑马的人，偷偷地告诉沙里福汗说，金在乌鲁木齐把哈萨克的一个巴彦毛拉营长逮捕了，叫他不要回乌鲁木齐。于是沙里福汗就直接逃到阿山去组织队伍，反对金树仁。我的另一个朋友马克苏提在吐鲁番也组织了队伍，并与金树仁的归化军交战。他受伤后被归化军围捕杀害。金树仁的归化军还把马克苏提的头挂在吐鲁番城里。马克苏提的反抗就这样失败了。

我回到迪化时，在老朋友赵得寿家里会见了陈中同志。陈中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当时他的公开职务是金树仁的军事参谋。我们几个经常谈论新疆的局势，陈中也认为这样发展下去，一定会发生政变。

后来，回族军队因为反对金树仁，把迪化包围了三天。回军撤走以后，金树仁命令我立即返回德国，并给金在德国留学的儿子和侄子们带去一百两黄金。因为金树仁催得紧，我于三月底离开了迪化。

当我走到苏联的斜米时，听说迪化发生了政变，但不了解详细情况。直到我到了莫斯科，会见了老朋友前苏联驻乌鲁木齐的总领事贝斯特洛夫和包国宁、普列霍夫，他们才告诉我是盛世才上了台。他们还说，盛的表现还不坏，对苏联挺友好。这时陈中也从新疆到了莫斯科。我向他了解情况，他说：他和陶明樾、张馨、赵得寿、格米林肯及归化军的领袖巴品古特和维族牧民等秘密组织起来，由归化军于四月十二日包围了省政府，枪一响，金树仁就从后门逃

跑了，先跑到塔城，又经过苏联到中国内地去了。当时盛世才率军住在离迪化四十里外的乌拉拜，金派人送命令给盛，叫他速返迪化扑灭叛乱。十三日傍晚，盛率军返抵迪化时，金已不知去向。盛答应与政变方面合作，于是选他当了督办。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

盛世才上台后的困难处境

盛世才虽然用狡诈的手段篡夺了“四·一二”政变的果实，夺得了政权，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

就地盘而言：整个南疆早在一九三二年底就与迪化政权完全隔离了。北疆马仲英掌握着大部地区，哈密、镇西、七角井以至吐鲁番、鄯善全归马军统辖，南疆的喀什也有马仲英的一部分势力。北边阿山则由马仲英的副师长马赫英占领，其后他又向塔城推进，占至额敏。伊犁张培元经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联络，和马仲英结成了反盛联盟，他已向乌苏推进，并占领了乌苏、绥来两地。奇台亦被金树仁旧部魏镇国由阿山退来进据，魏虽表面上答应服从迪化，其实是貌合神离。昌吉、呼图壁、阜康等地都在马仲英军包围之中。而且马仲英所占地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前线已越过达坂、柴窝堡，其前哨距迪化只有五十里。盛世才此时的防区，实际上只有迪化、塔城、呼图壁、昌吉、乾德、阜康、孚远等几个县城，广大农村都被维、回军占据，迪化也在包围之中。

就兵力而言：此时，盛在迪化的部队不过六千人左右（本地军约二千余人，东北军约三千余人，归化军不到一千人），另有少数部队分布在各外县据点，并都在被围困之中。同时，归化军大部分厌战，东北军又派系复杂，盛也不能全部掌握。而敌对的马仲英部，此时已扩张到万余人之众。且盛军多老弱不堪，马军皆年轻力壮。伊犁张培元连同被其控制和拉拢的东北军约八千人以上，马、张联盟之兵力超过盛军三倍之多。

就补给而言，马、张所占皆富饶之地，无论粮食还是人力之补充，均毫无顾虑；而盛所占的几座县城，人力单薄，存粮不多，粮食最多维持二三个月。

就人心而言，盛世才在金树仁时代，因经常打胜仗，还能得到一些汉族人在某种程度上的敬仰；紫民泉大胜，更提高了他的威望。但自他不经审讯就惨杀了“四·一二”政变诸领导人之后，威望逐渐下降。不仅“四·一二”政变的拥护者、同情者惴惴不安，一般民众也心里恐慌。在混乱时期，不少人从迪化逃到了内地，留在迪化的军政各机关负责人也都战战兢兢。金时代的旧官吏更倾向于张培元，回族多拥护马仲英，维族多拥护和加尼亚孜，其他各族人民对盛更无好感。

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又对盛施加压力。黄慕松回南京之后，国民党政府又派大员罗文幹（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兼司法行政部长）到新疆活动。委任马仲英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委任张培元为新编第八师师长，造成与盛的三角关系以牵制盛世才。

在以上这些困难的情况下如何维持政权，对盛世才来说，实在是个难题。

伪装进步“亲苏”求援

盛世才为了克服种种困难，采取了伪装进步，假意与苏联友好的办法，用以骗取新疆各族进步人士的拥护和苏联的帮助，稳固他的政权。

我在苏联时听说盛还不坏，就立即赶回塔城，并给盛打电报请示：我经过陈中转告，已回塔城，是否先回迪化？盛叫我立即去安定阿山。于是我以政府宣慰使的身份到呼布克蒙古亲王、鄂亲王、夏里瓦活佛家里去，把调解各族人民的纠纷，安定阿山，建设好新疆的意图向他们讲了，希望他们与哈萨克艾林王爷和解。他们同意了这个意见，便派了两个人护送我到阿山。一九三四年初，伊犁、阿山

两区和迪化基本平定，我经过塔城回迪化，才和盛世才见了第一面。盛鼓励了我几句，任命我为设计委员会委员、新疆土产公司总经理、反帝总会的民政部代理部长。反帝总会秘书长王寿成（真名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我关系很好。他向我详细介绍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情况。

盛世才写了《政府目前主要任务》一书，提出了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和平、建设、清廉六个方面。我帮他译成了维文。

盛世才的所谓亲苏，是这样开始的：一九三三年九月，盛先试探性地派外交署长陈德立到苏联领事馆去见孜拉肯（Злащкин）总领事，表示愿意亲苏。苏联与新疆毗连数千里，苏联方面当然希望它的边界之外有一个友好的政权，因此孜拉肯就表示愿意友好。第二天，盛即经陈德立将总领事孜拉肯、副领事甘宁（Канин）和领事馆的译员请到盛的家里吃饭，饭后在书房谈话，让领事看他的书籍，内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他向领事们说，这些书都是他密藏的，他在学生时代就相信社会主义，即使在金树仁白色恐怖时期他也经常研究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只有走共产党的道路才有前途，因此他希望与苏联合作，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马仲英、张培元都是国民党反动军队，要将他们消灭才能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孜拉肯答应将盛的意见呈报莫斯科。孜等走时，盛给他们每人赠送了一份贵重的礼物。孜拉肯向苏联政府呈报了他所了解的盛的情况，说盛是相信共产主义的，对马列主义的研究颇有心得。因为莫斯科对盛还未了解透，没有立即答复。盛在四面危急的时候，得不到具体答复，颇感焦虑，于是决定派陈德立和姚雄到莫斯科直接求援。他以为陈德立、姚雄都是共产党员，容易办事（实际上陈不是党员）。陈、姚于十月份去了莫斯科。这时莫斯科对盛还是半信半疑，因此就决定派较得力的干部阿布列索夫（Априев）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到新疆任驻迪化总领事，希望通过他对盛作进一步了解。盛遇事都和阿商议，对阿的话百依百

顺，因而获得了阿的好感，骗取了阿的信任。张义吾（中国共产党党员）等人向阿提出过警告，叫他不要过分相信盛世才，阿却被盛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给盛帮了大忙。阿除了直接给盛以军事援助外，还要求所有苏联派去的共产党员尽力协助盛，服从盛的命令。这些人也真的为盛做了许多工作。

一九三三年“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派陈中到南京向政府汇报政变情况。五月，陈中到了莫斯科，他觉得时间紧，不打算去南京，只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给南京政府。当时，我也在莫斯科，还帮他抄写过这个报告。陈中曾对我说：“目前看来盛世才还不坏，如果将来不好的话，照样可以像推翻金树仁一样推翻他。”他还告诉我，盛世才叫我赶紧回国，因阿山闹纠纷，互相残杀，要派我去当阿山宣慰使，待安定阿山后再让我当行政长。陈中从苏联回新疆后，就与“四·一二”政变许多参与者一道被盛世才杀害了。

陈中被盛杀害的消息，七月间才传到塔城。因为陈中从苏联回迪化路过塔城时，曾与张义吾商谈过多次，塔城很多人知道张义吾同陈中的关系好。行政长陈继善为了讨好盛，也曾向盛报告过这一情况，并请示如何处理。张义吾当时除了给赵得寿当秘书外，还任炮兵营营附。九月下旬盛来电令张晋省，张的友人连赵得寿在内都劝张别去，张还是决定去。他带了一个勤务兵住在迪化一个小旅店，将带的枪交给勤务兵，并嘱咐说：“如果晚上我不回来，你就带着两支枪自找生路去。”但出乎意料之外，盛却请张与家人共餐，餐毕请张到书室参观他的进步书籍，表示他信仰共产主义。（张见盛说话表示进步，也确实读了一些书，以后就不时到盛的书房借书看，才发现许多书都是陈中的，其中好几本还有陈中批阅的笔迹，有一本书上还有陈的印章，原来这些书是陈中被杀后盛没收来的。）盛这次见张义吾时，曾向张解释，枪杀陈中等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共产党员，而是因为他们阴谋叛乱。盛说：现在新疆民不聊生，不能再闹乱子了。还说，迪化还有二十几个共产党员（其实迪化当时并没有二十几个中共党员）都没杀。盛以此来说明他是不杀共

产党的。谈话中盛曾问张有什么打算。当张说想回内地时，盛立即假意挽留，说新疆正是用人之际，希望他在新疆好好干。不几日，就任命张为团参谋长，与赫洛夫斯基团长一起去解塔城之围。不久又让张帮他整编军队，将迪化本地军编为步兵第一团，任不识字的尤得胜为团长，张为副团长。除东北军、归化军、卫队团以外，步兵团也是盛的主力。

盛世才伪装进步，求得进步人士和苏联的帮助，平定了伊犁和阿山地区，但力量还不足以与马仲英抗衡。在一九三四年初张培元发动进攻的同时，马仲英亲自率领骑兵旅两万人（其中一半是临时扩充后只经过短期训练的新兵），从吐鲁番出发，长驱直入，于一月十二日包围了迪化，占领了城东飞机场和无线电台，以及城西的蜘蛛山。盛军仓皇应战，抗马军于南关之外。张义吾率步兵团保卫南梁，击退马军多次进攻。马又派一千多骑兵攻城北，幸得东北军的坚持，城北未失。马仲英如果采取猛攻的办法，本来是可以攻克迪化的，由于他不愿损失过多的兵力，而且认为迪化粮草缺乏，盛军不能久守，就采取了等其自己困死或自动投降的办法。在这万分危急之际，盛世才只得求苏联援助。为了表达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曾要求将新疆作为苏联一个自治区或加盟共和国，从而骗得了苏军的援助。苏联派出所谓“阿勒泰”军解了迪化之围，并迫使马仲英一直退到了南疆。

迪化解围之后，张义吾本应随同部队南下追击马军，盛却将张留在迪化，并伪善地说张新婚不久（张是马围城时结婚的），不必再去前线，可以留在迪化协助盛起草一些文件，如安民告示，政策纲领，妇女协会成立宣言等等。随即又派张去苏联，表面上说是送教育厅长张馨去莫斯科治疗眼疾和送盛的五弟世骥去莫斯科学习，实际上是要张到莫斯科去要求苏联给他武装一万军队的全部武器、服装和各种装备。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还要求张到莫斯科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并对张说，回来可以成立党的组织。盛还要张请苏联派些党员干部来新疆工作。

一九三四年四月，张义吾送张馨、盛世骥到了莫斯科。因等张馨治愈眼疾，住了三四个月。苏联方面虽然知道盛是小军阀出身，屠杀过共产党员，只是因为政权危难，才投靠苏联的，对盛的“诚意”有怀疑，但为了边界和平，也给了盛一些可能的支援。盛想的是要一万军队的装备，苏联却建议他不仅要整编军队，还应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推广文化教育事业。一九三五年，盛派我为全权代表，与苏联代表签订了由苏联贷款五百万卢布的合同，其中一百万用于修公路，其他用于买武器，办工厂。苏联方面还派许多专家顾问帮助建立了炼油厂、学校、医院。这时，新疆才开始有些经济、教育、文化方面的建设事业。

关于派遣党员干部、苏联后来只派了十几个人，即王立祥（曾秀夫）、王寿成（俞秀松）、刘贤成（任岳）、满素尔（维族）、栾宝庭（嵇直）、万献庭（张一范）、郑义钧（郑一俊）、王宝乾（赵实）、于成发、赵云蓉、高秀影（王一）、陈培生（刘敬忠）、赵国元（赵雨时）、阿拜（哈族）、哈的尔阿吉（维族）、色以提阿吉（维族）、哈森木（维族）和冀朝鼎之妻等。

张义吾苏联之行，使盛唯一感到不满的是没有办成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其实这是当然的事，因为他既不够党员条件，也不能缺席入党。苏联给他的答复是希望他好好干，将来有机会再入党。（一九三八年盛去莫斯科时，据他自己说他加入了苏共，不知是否有其事。）

当时新疆另两派势力也都想投靠苏联。和加尼牙孜在哈密时，就多次受到外蒙的帮助，到喀什后也对苏联表示亲善。一九三四年七月，他与盛世才妥协，这是苏联领事从中调解的，否则他决不会把军队交给盛世才，自己到迪化就任一个空头副主席。马仲英部下也有些思想进步的人，其中有些还是中共党员，因白色恐怖而失掉了党的关系，如张雅韶、苏继善、吴应旗等。他们极力对马劝说：依靠苏联方能在新疆取得胜利。所以马仲英一占领奇台，就派懂俄语的惠大山去阿山与苏联领事馆接洽，但因奇台失守而未成行。马仲

英退到喀什时，还亲自到苏联领事馆去接洽过。马在喀什失败后，将万余兵力交马虎山带领向莎车、和田方面撤退，自己却退入苏联境内，也是表示亲苏。这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的事。

盛世才上台后并不是不想依靠国民党，只因为他知道国民党蒋介石只相信自己的嫡系和有实力的人，而他既不是蒋的嫡系，实力又远不如马仲英，甚至还不如张培元，所以他不敢完全依靠国民党。事实也正是这样，国民党派去新疆的大员——黄慕松和罗文幹都不特别重视他，甚至想吃掉他，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但他在以后伪装进步的整个过程中，与国民党还是藕断丝连的。他一上台便派陈中向南京政府作报告，又在南京经常驻有代表。一九四二年初，他在未揭开伪装而目之前，还派他的五弟盛世骥到重庆谒见蒋介石。所以一九四二年底，蒋介石派第一批国民党员赴新疆工作训话时，就要求这些国民党员到新疆后要绝对信赖盛世才（见朱家骅著《新疆壮行词》：“昨天总裁训话，已经讲得很明白，最重要之点，就是中央对盛主任委员（世才）绝对寄以信赖”）。

盛世才伪装进步，口头上叫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在他攫取政权时期的种种事实证明，他是想与日本帝国主义拉关系的。所以“四·一二”政变的当天晚上，在第一次维持委员会的会议上，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作掩护的日本间谍头子白毓秀才自告奋勇要到南山去找盛世才回迪化来参加新政权。但是白一出城郊即被金树仁军打死，后来还誉为烈士（因为当时谁也不知道白是日本间谍）。关于白毓秀的情况，苏联塔什干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一九五四年出版的 И. Т. 波林诺夫著《英日帝国主义在新疆的阴谋活动》中写道：“为了确立在新疆的谍报机关的总领导，日本人曾在一九三二年力求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过去留学日本的自己的走狗，哈密人白毓秀为调查新疆的特派员。在一九三三年‘四·一二’政变时，白毓秀被打死了。”

一九三二年，日本特务机关曾派一个大间谍叫大西忠（化名于华亭）的去新疆活动。此人行至甘肃时被马仲英军扣押，他伪称是

河北商人要去新疆。因他自称会电报技术，被马仲英留用。一九三三年六月，马仲英自奇台撤退时，大西忠藏于民间，投了盛世才。盛将其带至迪化，以上宾相待，多次约请他与家人共餐，并安排他居于督办公署之内，令其翻译密电数月。一九三三年底，盛伪装亲苏后，在苏方要求下，不得不将大西忠扣押，但在狱中盛还对大西忠特别优待。盛多次清洗监狱，屠杀过成千上万的无辜者，但对大西忠却始终不杀。大西忠在盛狱中九年，曾对人说：他相信盛世才“亲苏”不会长久，盛是亲日的，总有一天盛会释放他。以后大西忠因病医治无效才死去。一九三三年日本出版的《世界知识》中报道说，盛是亲日的，盛军中有日本人服务。这个日本人就是指大西忠。

一九三七年日本参谋总部还派了一个今田少佐去新疆活动。此人是盛世才的旧相识(可能是同学)。但这个今田少佐和几个随行军官因带了大批药品、照相机、探测器等可疑物品，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抵兰州时，正逢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掀起抗日高潮，他们受到朱绍良的阻挡，没有去成。

以上事实说明，盛世才在他的政权摇摇欲坠时，并不是不想投靠日本，投靠国民党，而是因为当时他所占的迪化方圆不到百里，靠日本远水救不了近火，靠国民党此路不通，才只好伪装亲苏。正因为这样，盛世才一面伪装进步，一面制造种种理由捕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一面表示亲苏，一面又诬控苏联驻新疆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和诬控苏联派去的人是托派，这些人不是被逮捕屠杀，就是被驱逐出境。

一九三七年，盛呈请南京政府任命我出任驻苏联斋桑领事时，我听说阿布列索夫总领事被撤换了。有一天，阿布列索夫派人请我到 he 那里去。我去时，见他低着头，背着手，在房子里踱来踱去，他问我：“你相信不相信盛世才？”我感到惊奇，说：“我还没看出什么问题。”他说：“他岳父在伊犁当屯垦使，贪污腐化，刮地皮。他老婆的情夫做大买卖，贪污，这些情况很不好。”他边说边摇头。我告诉他这些事情我也知道。他说：“我们今天的谈话不要告诉别人。”“五

一”节过后第二天，我和阿一起离开迪化到乌苏。在乌苏住了一夜，第二天阿布列索夫从伊犁出国，我从塔城到斋桑，离别时依依不舍，紧紧拥抱，都流下了眼泪。以后才知道，阿布列索夫将他了解的这些情况报告了斯大林，盛看出了阿对他的看法，就先下手为强，诬告了阿，所以斯大林把阿布列索夫调回了苏联。阿回到苏联以后一个月左右，以挑拨苏联和新疆的关系的罪名被枪毙了。这件事直至盛世才彻底叛变，才真相大白。

盛伪装进步时期，时常高叫“清廉”，但他在篡夺政权的初期已大发横财了。他借口军事开支、战争费用，令财政厅加紧印发钞票，印出的钞票每日都在源源不断地运入他的督办公署。在混乱期间，无人去查问他的开销，他也不向任何人报账，只凭一个手谕，要多少钱就拿多少钱。除将财政厅库存黄金搜索一空外，还找来南梁几个宝石商人为他大买钻石。商人送来钻石后，即用担架抬纸币出去，这是目睹人当面同我说的。他弄到黄金、钻石等贵重物品，不敢在新疆保存，都是立即设法送回内地去。他二弟、三弟在内地大做生意，资本也是盛贪污得来的。

有一次，盛曾对张义吾说：那时如果苏联领事不答应帮助他的话，他是准备放弃迪化，带领卫队去塔城经苏联回内地去的。

盛世才的特务组织和阴谋活动

为了巩固新政权，苏联曾向盛世才提出在新疆组织政治监察机构的建议，并提议张义吾任政治监察管理局局长。开始盛同意了。但因张当时在莫斯科等张馨治疗眼疾，不能马上回新疆，苏联就派顾问包国宁（Приходько）、秘书长王立祥到迪化帮助筹备组织这个机构。这是一九三四年七月间的事。盛世才为了自己控制这个机构，以张义吾未回国为借口，委任他的侦探队长王玉书为代理局长，又委任他的友人陈东白、郎道衡、王延龄为科长。

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张义吾回到了迪化。盛不愿让张到监察

管理局工作，借口南疆和平伊始，百事待举，要张到南疆担任负责工作。以后经阿布列索夫的质询，盛才不得不让张到该局去。但只委张以副局长兼代局长职务。以后改组为公安管理处时，才正式委张为处长。为了监视张等共产党员的工作，盛还派他的老友王宜之及妹夫之弟彭吉楨到该局工作。

盛自始至终都想把政治监察机构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但这个机构中的主要干部都是苏联派来的，除张义吾、熊效远、王立祥之外，还有副处长刘贤成、哈密区前后任局长的栾宝庭（嵇直，文化大革命前在内务部工作）、于成发、科长色以提阿吉（维族）、科长哈的尔阿吉（维族）、镇西公安局长阿拜（哈族）以及科长卞方明（卞福林）、胡鹏举（胡后来被盛世才杀害，卞被盛扣押八年之久，至盛离新疆后才获释）。盛无法将这些人控制起来或拉拢过去，就用各种阴谋诡计打击这些人，慢慢缩小其权力。一九三五年一月，盛将政治监察总局改为保安总局，一九三六年三月，又改为公安管理处，企图将政治监察机构变为普通警察机关，同时还挑拨该机构与其他各机关的关系，破坏这些人的威信。比如盛时常下令要该机构逮捕他所指定的无辜者，被捕者分明无罪也不准开释；对真正的犯罪分子，特别是他的走狗和亲朋，他都极力袒护，不准惩办。这就不能不引起这些人对盛的不满。一九三七年春天，盛借口这些人调查他的军队，撤掉了张义吾和刘贤成的职务。从此公安管理处就被盛抓到手中，成了他屠杀革命志士和无辜者的工具了。盛撤了张、刘的职务后，他仍花言巧语要张、刘留在新疆，以作阿克苏正副行政长的名义将他二人扣在新疆。张、刘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但他坚持不发给二人出国护照。经阿布列索夫再三催促，直到阿被调回苏联时，张、刘才被准许离开新疆去了苏联。

公安管理处本来是专门对付帝国主义的间谍和反革命分子、贪污官吏的组织，但是张、刘在公安管理处时，盛对这个机构却不予信任，另外搞了他自己的侦探系统。其中一个是在督办公署侦探队，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先由军官学校毕业生（即盛的学生）王

玉书任队长，以后盛为了灭口把王杀了，改由李英奇负责，盛直接指挥，其密探有数千人，分布在全疆。督署设有特别监狱，可以不经任何法律手续随便捕人，任意屠杀。这些密探被利用一个时期后多数被盛杀害。另一个是盛直接指挥的绝密组织，是他上台不久就开始组织的，人数极少，如李溥霖、王宜之，是专门监视和侦察所有苏方人员、共产党人及进步分子的。一些所谓“阴谋暴动案”，就是盛根据这些密探的报告制造出来的。这些特工都是顽固的反共分子，盛特别信任他们，一直利用他们到盛离开新疆为止。此外，一九三七年初，督署政训处还增设了一个侦探科，专门在军队中进行特工活动，后来为盛制造了多次所谓“大阴谋案”、“阴谋暴动案”，他们将苏联派去的干部、专家、顾问甚至总领事、领事以及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都诬之为托派，一批一批地陷害和屠杀。最后在他公开撕破伪装以后，竟胡说制造的这些所谓“阴谋暴动案”，都是共产党人制造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盛打电报叫我回新疆汇报斋桑领事工作情况。我于三月底离开斋桑，经过阿勒马特回国，到精河县住了一夜，与姚雄见了面。第二天，我坐苏联运货汽车往迪化。走到离精河县城二十华里的地方时，从后面来了一辆小汽车，赶到货车前面停住，从车上下来几个人截住货车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包尔汉。”“请你下来，迪化来电叫你回伊犁去。”他们把我的行李拉下车后让货车开走，命令我举手并对我搜身，把我逮捕了。在伊犁公安局关押了一个星期后，公安局长对我说：“盛督办来电令你到迪化，说再派一个人护送你。”把我押到迪化后，于四月十二日送进第二监狱。同房有三四个人，他们告诉我说，盛已押了好几万人，并没收了这些人的财产。

大约是一九四〇年的一天，监狱看管员把我带到一间房子里，叫我把一些汉文文件译成俄文，并用打字机打出来。原来是盛世才给斯大林的一封信，大意是：调来新疆帮助他的人对他态度不好，都是托派，请斯大林另派一些他自己认为可靠的人来新疆。还翻译